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SN 1008-7095,CN 31-1778/C

##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弹性与理性:1956-1962年上海地区的市场竞争  
作者: 张一平  
DOI: 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8.027  
网络首发日期: 2018-07-03  
引用格式: 张一平. 弹性与理性:1956-1962年上海地区的市场竞争.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8.027>



**网络首发:** 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 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弹性与理性：1956—1962 年上海地区的市场竞争

张一平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新中国建立后，随着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公有制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上海地区城乡市场的商品流通形成了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私营商业的三分格局。随着传统的流通渠道被压缩，旧有的商业关系被打破，从而公营集体和私营个体两大类的竞争、公营单位之间的竞争以及机构内部流通行为，演变为新的市场形态。行政机构与地方产业互动中，不同地区、部门、行业间要素流动的弹性和利益博弈的经济理性，对后来上海地区的市场发展及当今长三角的竞争格局有着深远影响。

**关键词：**新中国；上海地区；市场竞争；弹性与理性

新中国建立以后，通过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新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管理模式。原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市场体系逐渐为中央-地方-企业的计划安排所替代，垂直的单位化管理打破了区域内的商业、商人网络，将上海承载的商业、贸易、金融的中心地功能剥离，使之向单一的工业基地转化。随着国营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一统天下，商品的交易空间和管理体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近代以来的港口-腹地、城市-农村、沿海-内地的市场层级被条块分割的行政部门覆盖。生产要素主要通过调拨向上海流动和集中，产品和企业的竞争转变为行政机构、行业部门的协调，从而削弱了经济组织、市场主体的塑造和培育。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行政与地方产业的相互渗透对后来的市场模式，及当今长三角的地区竞争有着深远影响。

对于这一段经济史的研究，基本切入点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政府用行政手段取代市场机制来进行资源配置，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市场调节作用逐渐衰微。<sup>1</sup>夏林、董国强曾对 1956—1957 年有限开放自由市场政策的出台背景、实施过程及其社会绩效进行了考察，认为此次有限开放自由市场政策的结束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次倒退，预示着“计划”与“市场”的冲突将会持续上演。<sup>2</sup>其研究侧重于政策分析而非实证案例，未着力对基层细致描述。冯筱才也注意到了自由市场后续的政策背景，指出这是 1958 年至 1963 年间一种缓解饥荒的举措，也是为了应付黑市带来的经济冲击。<sup>3</sup>他将打击“投机倒把”限定于

作者简介：张一平，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sup>1</sup>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上卷，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年，第 301 页。

<sup>2</sup> 夏林、董国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有限开放自由市场政策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27 页。

<sup>3</sup> 冯筱才：《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38 页。

公私竞争和中共对市场本质的理解，其实简略了不同地区、行业和部门的竞争。与其说是出于对市场本质理解的差错，不如说是基于财政需求的利益表达。因此，必须超越公与私、计划与市场的二元划分，据之以实情，方能反映当时真实的市场竞争。因此，笔者以工商业发达的上海地区为中心，时间覆盖社会主义改造后 1956 至 1962 年的市场活跃期，通过分析公营商业的市场控制、集市贸易与市场竞争、集体与个体经济的博弈，来探讨市场形态的弹性和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理性。本文论及的市场，主要是指产品市场及交易管理，不涉及生产要素市场（土地、劳动力、资本等）。重点关注高度集中统一的需要与市场流通自由之间的张力，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市场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切实考虑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治理的宏观背景。

### 一、公营商业的建立与市场控制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在打击投机、统一金融和货币的过程中，掌握经济资源，开始建立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国营与私人经济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二者被视为对立关系，国家的商业资本起领导作用，使私人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在有益于商品流通和市场调剂的原则下活动。工商业关系上以工为主，商业占多数的城市也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国家主要经营重工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以服务于工农业品的流通、服务于人民为主，防止投机现象。公私关系上则确定以公为主。<sup>4</sup> 1950 年 5 月 20 日刘少奇指出，合作社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中间环节，目的是降低成本，经过合作社获得比较廉价的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把农民的农产品卖给国家工厂或私人工厂，而不经商人的手去进行这些交换，<sup>5</sup> 达到免除商人中间剥削的目标。

国家实行加工订货、统购统销是为了掌握经济领导权。从主要行业开始，通过收购掌握原料和按计划分配原料，使资本主义工业根据要求进行生产，产品生产出来以后不能自销，由国家统一收购。私营工业和商业之间的关系被割断，物资都控制在国家手里。同时割断私营工商业和农民的关系，使得私营工商业不得不服从国家领导，否则就不给原料和物资。1952 年的三反五反推进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五反前上海加工订货的只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 50%，到大合营前已达 95% 左右。这为公私合营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后，私营工业的生产已和市场割断了联系，过去他们很关心自己产品的牌子是否吃得开，现在统统由国家包销，市场的反映听不到。<sup>6</sup> 不去设法提高质量和增加花色品种，形成工业生产上的闭门造车。

当时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贸易总公司，并建立粮食、煤业、日用品、花纱布、盐业、油脂、

<sup>4</sup> 狄超白：《论城乡交换》，《人民日报》1949-8-28，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6、18 页。

<sup>5</sup> 刘少奇：《创办合作社的目的是为了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商体制卷），第 21 页。

<sup>6</sup> 忻元锡关于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问题的报告，1956-11-6，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A76-2-171-45。

医药、烟麻、五金机械、交电等商业公司,以及上海市零售公司,开设 100 多个门市部。国营商业在稳定市场、恢复经济秩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53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国家为了掌握农副产品,加快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茶叶、烤烟、大麻等重要农产品及出口物资进行统一收购,规定只准国营专业公司或委托供销合作社收购。国营商业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工业品实行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割断私营商业的城乡联系、工商联系和商商联系,为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基础。<sup>7</sup>上海市商品零售额中,社会主义经济 1952 年占 19.0%,1957 年为 26.7%;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经济 1952 年占 0.4%,1957 年占 70.2%;资本主义经济 1952 年占 80.6%,1957 年占 3.1%。<sup>8</sup>

1957 年 8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明确提出:凡属国家规定计划收购的农产品,如粮食、油料、棉花,一律不开放市场,全部由国家计划收购。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完成以后,农民自己留用的部分,如要出卖,不准在市场上出售,必须卖给国家的收购商店。1957 年底,国务院下达《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扩大地方在物资分配、计划管理上的权力,商业价格实行分级管理。撤销全国性专业公司,按地方行政区设立专业局处。将国家在农村的商业基层机构和人员下放给公社,合并商业网点,关闭自由市场。1958 年至 1960 年社会零售商业网点减少 142 万余个,占原有网点总数的 73%,人员减少 194 万,占原有人数的 34%。

到 1958 年,农副产品基本都由国营商业独家收购。1961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产品收购工作中的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明确提出三类物资的收购政策,一类物资(粮食、棉花、食油)实行统购统销,二类物资(其他重要农产品)实行合同派购政策,三类物资(统购派购以外的农副产品)实行议价政策。1962 年底国务院公布了一个目录,共 34 类 100 种左右产品。<sup>9</sup>

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垄断农村市场带来三个方面的影响:购销损害农民利益;农副业和兼业受到限制;商业流通体制僵化。<sup>10</sup>农民参与权受限,市场竞争形态改变。受限制的市场主体从个体农民,延伸到了合作社、社队企业等基层单位,甚至地方部门。但是它们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仍会参与市场竞争。像供销社的运作虽有垄断,但其组织、人员均有漏洞,因而农村的贩卖禁而不绝。

当时限制改造私人商业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变消费为生产,过度商业化妨碍工业化;二是进行产权改造。传统社会对商人的评价向来较低,国家实力弱的时候容纳或鼓励,国家实

<sup>7</sup> 祝兆松主编:《上海计划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

<sup>8</sup> 上海市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成就(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经济成分的变化),1958-3-14,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 B123-3-1571。

<sup>9</sup> 纪良纲、刘东英:《中国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研究》,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sup>10</sup>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上卷,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306页。

力强则限制或排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要素市场存在的基础,而要素市场的存在又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单一公有制的形成,使市场机制失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个基础。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严格的计划管理、人口流动限制,使得历史上的长途贩运不再兴盛。上海市场更多地依赖江浙等地,而江浙沪的市场调剂,也需得到政府的同意和商业部门的协助。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营商业从城市到乡村建立了一整套的采购和供应机构,构成了庞大的商业网。为了贯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国营商业的体制环节主要按照行政区划来逐级建立。为了加强对私人工商业的管理,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及经销代销等形式,成立了许多专门机构——各级专业公司、专业批发站、采购站、供应站等。因此在整个商业体系中,庞大的机构环节就这样建立起来了。<sup>11</sup>同时,商业部门包下来割断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必然会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社会主义改造为了稳定物价,统一集中是必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关系由过去的千条线变为两条绳,就不灵活了。当时有人敏锐地指出,工商利润之争本质上是个财政任务问题。<sup>12</sup>甚至有人提出国家商业行政和社会主义商业企业划开。<sup>13</sup>问题还不在于公家商业来替代经纪人的作用,而是当时市场单一化、竞争性削弱,导致了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尤其是公私合营排斥了私人商店和商贩,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垄断市场,长期形成的流通渠道不再畅通,造成了供需不平衡、积压与脱销并存。打造一个杜绝商贩的商业,实质上是把商品流通看作生产过程的延伸,来降低被视为生产性支出的流通费用。但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同样会产生巨大支出,其成本超出了既有设想。

## 二、集市贸易与市场竞争的弹性呈现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基本形成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格局,部分农副产品小商品缺乏灵活的流通渠道。

首先,商业部门的负担非常沉重,什么东西都要包下。上海市管加工订货的商业局和29000多个工厂发生关系,上海的工业产品面向全国和国外,商品分配都要负责。当时采用的办法是把“各路诸侯”都请来开会,问大家都要些什么,有20多个公司、2万多品种,汇集起来送交工业部门生产。等到造成计划交工业部门生产时,需要的产品又变了,但工业部门仍按原计划生产,结果产品旺销和产品积压并存。这与工业部门和市场脱节、商业部门全部包下来有关,不能准确反映消费者的需要和正确指导工业生产。

其次,连年来工业产品质量下降,花色品种减少,货不对路。暖水瓶是定时炸弹,温度表是直进主义的,衬衫是不中不西的和尚衣,三角尺成了跷跷板。统一规格,清一色花色品种减少,绒线只有一种品牌,衬衫只有90、95、100厘米的。为了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

<sup>11</sup> 高翔:《大砍商品流转的多余环节是商业企业经营管理的革命》,《经济研究》1958年第10期,第58-67页。

<sup>12</sup> 胡铁生:《关于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问题》,《财经研究》1957年第1期,第1-4页。

<sup>13</sup> 赵清心:《关于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初步研究》,《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第78-99页。

义工商业,工业部门利润少而商业部门利润大,对此工业部门很有意见。原先主要是公私矛盾,为了限制私营工商业没有什么话说,合营以后工商业关系变为公家内部矛盾。过去一吨甘油商业部门买进是 1500 元,卖出是 4500 元,现在工厂要把 3000 元利润拿回,不给就按 4300 元一吨出售。<sup>14</sup>这样容易造成纠纷。

再次,农产品采取统购办法,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农民利益和保证工业原料的供应,却忽视了农村多种多样的副业和土特产生产。城市批发商基本上没有了,很少有人到农村去收购副业产品,农民不经营副业,收入大大减少。城市小土特产的经营也紧张起来,上海一度发生的草纸供应紧张与此有关。

针对一家独大带来的问题,陈云在 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发言中提出要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1957 年 3 月,根据国务院《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的指示》,上海市制订了《上海自由市场管理办法》,全市陆续建立蔬菜交易市场 2 个,水产交易市场 3 个,副食品交易市场 4 个,药材交易市场 1 个,禽蛋南北货代理行 22 个,郊区恢复集贸市场 211 处。在自由市场恢复后的半年中,成交禽蛋、水产、蔬菜 40 多万吨,全市成交 2 亿元。1958 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限制家庭副业,市区集贸市场关闭。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1959 年 9 月、1960 年 1 月,分别发出《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上海开始恢复农村集市贸易。1961 年 2 月,郊区乡镇已建立农贸市场 2235 处,在市区和市郊接壤地区自发建立 100 多个农贸市场。<sup>15</sup>

1961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商业四十条),重点解决农副产品收购过头问题。推广农产品收购合同制,分期分批提高若干农产品收购价格。恢复必要的国营商业专业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发挥小商小贩的经营积极性和经营特点。1962 年 9 月 27 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商品流通分为三个渠道: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这显然是将市场类型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对应。商业是联系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桥梁。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属于计划市场,而集市贸易是一个被允许的自由市场,作为一条必要的补充渠道,允许其连接城与乡、批发与零售。

在国家主导的市场体系中,物资和物价管理非常严格,自由市场并不自由。第一,农副产品有其流通范围。除了第一类物资以外,凡第三类物资和完成国家定购或计划收购任务以后的自留和超产部分的第二类物资,可以拿到自由市场进行交易。上海市农副产品的初步分类为:第一类:粮食、棉花、油料,实施统购统销。第二类:猪、牛、鸡、鸭、鸡蛋、鸭蛋、兔、水产品(集体生产单位海洋捕捞和内河养捕的鱼虾蟹)、皮张、蚕茧、稻草以及国家计

<sup>14</sup> 析元锡关于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问题的报告,1956-11-6,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A76-2-171-45。

<sup>15</sup> 祝兆松主编:《上海计划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34页。

划面积种植的蔬菜、西瓜、甜瓜、水果和中药材,通过合同进行订购或计划收购。第三类即第一第二类以外的。第二,自由市场的购销对象有限制。反对弃农经商、不许倒手转卖,不准集体消费者到市场上直接向生产者购买。让农民有自留地和搞家庭副业,前提是不妨碍集体经济,决不能变成主要是商贩的市场。第三,自由市场上的买卖价格,由交易双方随行就市,自由议定。国营商业要起平抑作用,既不能放任不管,又不能用行政办法硬管。<sup>16</sup>对于自由市场的领导和管理,是要切实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利用其补充作用,限制其消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试图通过绝对的物价稳定来主导市场。如果市场上商品较多、价格低于国营牌价的,应当按国营牌价收购,以保护生产者利益和生产积极性。市场上商品较少、价格过高时,应当设法供应,以调剂供求,平抑价格。在外省采购时,对于某些商品虽低于当地集市价格,但买回来要高于本市自由市场价格出售的,一般不应采购,以免刺激物价上涨。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国营商业参与自由市场不以利润为目标,经营上要贯彻不赔不赚或少赚的精神,逐步做到保本自给或略有微利;二是价格不能成为市场供需的信号导向。经营原则为保本不赔,坚决反对单纯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sup>17</sup>这反映了供给制安排下不分你我、不计利润的理想观念,忽视经济核算与经济利益的背后是经济责任与激励的缺位。那么相对于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个体农民和商贩,就缺乏灵活性和竞争力,免不了“资本主义苗头”的蔓延,以及黑市价的冲击。

因此,当1960年12月以来,在上海市郊区各县集市贸易促进农副业生产、活跃农村经济,调剂市场供需和增加社员收入的同时,有些集体单位或社员却“不顾大局”,把国家计划收购的大田面积产品,或应由国家计划收购任务的产品,以高价在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加上管理不严,有些商贩利用地区之间的集市差价倒运贩卖,抬价牟利,扰乱市场秩序,因而不得不制定加强集市贸易市场管理的办法:<sup>18</sup>一是限制产品进入集贸市场;二是限制交易主体和场所,机关、企业、学校、部队等集体单位不准参加集市贸易的购销活动,严格禁止商贩和场外交易活动;三是实行市场管制,凡集体单位和社员个人订购的猪、禽、蛋、兔,必须持有订购卡。凡外地来参加集市贸易出售订购和计划收购的农副产品没有证明的,其物资只准卖给集市贸易服务所。

至1961年8月,上海市场总的来说比较活跃。但部分职工认为物价涨后生活水平降低,“现在的东西多,眼福有,口福没有”。“除了米、布、煤球以外,都涨价了,工资不够开支”,“集市贸易是好,商品多了,但是,对凭证的商品太差了(蔬菜)”。部分职工羡慕农民和小商贩收入高。上海对集市贸易还有较多顾虑,有的主张还是搞国营和合作社商业二条渠道,认为上海这个大城市,如果搞集市贸易,开放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思想会抬头,贩子会倒手

<sup>16</sup> 关于城乡集市贸易问题的几点意见(草稿),上海市第二商业局,1961-8-2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B98-1-857-30。

<sup>17</sup> 关于开展郊区集市贸易副食品购销活动的意见(讨论稿),1961-5-31,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B98-4-1436。

<sup>18</sup> 关于郊区农村集市贸易市场管理的若干规定(草稿),1961-9-30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B98-4-1436。

抬价。有的认为可以搞两条半渠道,允许生产者携带产品进城,国家协商价格收购纳入分配计划,按牌价销售,也就是只要批发,不放零售。而在对外采购、组织货源上,哪里有东西,就集中到那里采购,浙江嘉兴专区就有上海五六个区在采购。同时对郊区服务所的货源没兴趣,去也要挑挑拣拣。有些区在外省采购商品,以集市协商价格成交,还要给些物资交换。<sup>19</sup>可见商业部门也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以获得物资为首要目标。

相比而言,江苏集市上的交易(包括场外交易)更为活跃。1961年1月,全省开通了44个集市贸易市场,农村1556个公社(2500个集镇)中已有80%的公社开放了集市贸易。上市人多、品种多、数量多,有买有卖、有吃有玩,被社员称之为开心、谈心、散心的好地方,承担了市场交易、社会交流和娱乐休闲功能。同时,行政化的商业部门也存在“大干部送上门,中干部开后门,一般干部转脚跟”的问题,另有货源不足,粮站、糕点店发生盗窃情况。在农副产品的收购、派购和集市贸易上,批发环节库存太多,基层太少,不能适应农民的迫切需要。1959年7月至1960年11月,收购了270多万生猪,54.2%没有返还给农民。过去猪死了农民双脚跳,现在猪死了农民哈哈笑,因为可以留给自己了。<sup>20</sup>当时集市贸易价格比较紊乱,贩运较多,在地区之间特别是省与省边界地区,27个县市的公社与山东、安徽、上海等五省市31个县相邻,有些地区为了防止商品外流,采取了民兵站岗办法,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市场交易的频繁。

### 三、集体与个体:交易空间中的经济理性

近两百多年来,中国农村盘根错节的市场体系的存在,使中国社会得以应对人口增长和土地短缺的压力。而集体化体系的目标,在于使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定的手段,将中国劳苦农民的产品收集到国家手中。<sup>21</sup>因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并非政府与干部的简单对立面,其根除或抬头也不是一个从压制到翻转的情节。一方面,通过培养干部与积极分子队伍,以取代过去中间掮客对于税赋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家如何解决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工人、行政等大量非农业人口的生活供应和财政需求,涉及社会分工、行政干预、市场体系之间关系的处理。

以上海地区为例,1959年3月以来,部分工厂企业擅自下乡以抬价等方式直接向人民公社采购,有些公社强调增加收入不愿将农副产品卖给国家。城乡部分商品供应较为紧张,小贩趁机活跃,有些地区部分农民流入城市从事商贩等活动,增加粮食制品外流和饮食业供应的紧张气氛。<sup>22</sup>一方面是供需紧张,另一方面是工厂、生产队均为经济利益主体,形成

<sup>19</sup>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关于当前商业干部中对集市贸易等问题的思想反映,1961-8-15,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 B98-1-857-46。

<sup>20</sup> 吴仲邨同志在地、市委市场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61-2-4,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 3039-长-3。

<sup>21</sup>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9、168页。

<sup>22</sup> 上海市第一、第二商业局委员会关于当前城乡市场管理中若干情况的材料,1959-5-1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 B182-1-1102-32。

特殊的市场关系。因此并不能仅仅视为国家的一个单位、部门,或是国家政策的代表者与执行者,简单与自由市场、商贩等对立。

1958年初上海市许多摊贩拿着介绍信到嘉兴菱湖地区自由采购,通过当地公司转介绍给水产合作商店拨给,价格按当地收购价加14%包括税收。<sup>23</sup>上海市南翔、方家窑、七宝三个批发所,原先每天各有200担左右的鱼货供应,由于摊贩下乡,缩减至每天30-50担左右。<sup>24</sup>1961年6月25日,2个商贩和40个农民从黄岩运来一船草席共1015条,商贩逃走,40个农民吵了3天,甚至要到市委去请求解决。<sup>25</sup>1962年二三季度,上海县投机贩卖活动相当多,在集市上公开设摊,贩卖统购、派购物资。北新泾、龙华集市上贩卖粮油的一度达到集市摊位70%左右,每日成交粮油上万斤。全县投机获利500元以上的176户,其中1000元以上的有79户。农民弃农经商十分严重,个别生产队曾达到80%。<sup>26</sup>甚至上海城市里陆续出现了一些买卖工业品的非法市场,在市区内自发形成的农副产品自由市场中商贩有所发展。外地商贩利用市场供应水平的不平衡,和上海黄牛商贩勾结,在城乡之间两头倒卖。贩卖的商品从农副产品、各种工业品、废品旧货以至票证、金融商品等。交易的价格一般高于牌价一、二倍乃至数倍不等。盛行行话、黑话,往往利用一些茶楼、旅馆等公共场所作为交易据点。<sup>27</sup>

集体单位未经批准,以物易物仍然发展,生产队经商活动有所增加。上海某单位于1962年3月间开轮船3艘、拖船14只到浙江余杭,抬价抢购荸荠60万余斤,以及鲜藕、猪肉、鲜鱼等,伪装运走。<sup>28</sup>城市人口集中,购买力水平高,市场容量大,上市商品供不应求。上海闸北区北站市场,每天天尚未明,卖东西的还没有进场,买东西的已经围聚在场外等候了,常常是一人出售物品,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围着抢。由于城市集市胃口大、销路好、价格高,刺激生产队和社员长途运销,尤其是城市周围交通线上的农村,而且多是远道而来。上海市闸北区北站市场,多数来自浙江的杭州、余姚、萧山、绍兴、临平、湖州、上虞等县,1961年1月4日调查了91个人,来自浙江的57人,江苏的19人,山东、安徽的各1人,本市农民只有13人。<sup>29</sup>

在浙江省,1957年农民的自由运销,引起了产销市场的混乱,被认为影响农业生产和合作化的巩固,影响物资有计划分配,造成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由于抬价抢购,农民对国家的收购价格更加不满,认为供销社是“剥削”,并打骂或扣留供销社干部,如萧山复兴高级社联名控告、请愿。另外四个农业社派代表请愿要求自销土纸,梅家坞农业社因要求提高

<sup>23</sup> 国营上海水产供销公司第一批发部关于本市摊贩在嘉兴地区采购淡水鱼影响我部计划请核示的报告,1958-2-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 B125-2-191-1。

<sup>24</sup> 国营上海水产供销公司第一批发部关于鱼贩下乡抬价抢购影响春节供应货源转请及时设法制止的报告,1958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 B125-2-191-2。

<sup>25</sup> 关于各区加强市场管理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1961-6-30,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 B182-1-1145-23。

<sup>26</sup> 农村市场调查专题报告之一:关于当前农村市场管理工作的调查报告(草稿),1963-8-28,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 B102-1-12-1。

<sup>27</sup>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上海城市市场管理工作,1961-12-1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 B182-1-1145-29。

<sup>28</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8-1965)》(商业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787页。

<sup>29</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8-1965)》(商业卷),第767-768页。

茶叶价格,扣留了公家汽车不准装运。

农民并不如政府设想的那样,会理解开放自由市场的目的、范围。他们关心各种差价特别是地区差价潜在的商业利润,而不了解地区差价组成(税收、经营管理费、利润)与国家的关系,往往想通过自销或经商来增加社员收入。同时地区差价吸引了农民与销地经营单位抢购物资,有的单位为了抓货源,还采取了高价吸引和写信联系等做法,造成了黑市猖狂、牌价脱离市价。如废杂铜浙江收购价为0.7—0.8元,上海蓬莱区黑市2.5—3元一斤;元胡东阳平均收购价54元,上海黑市价160—170元一担;白术产地价格为160元,上海黑市价360—380元一担;土丝收购价每百两45元,上海黑市价70—100元。<sup>30</sup>因此,如完全采用缩小差价的办法解决,将造成国家收入减少、社会的购买力相对提高,使得国家财经收支和物资供求之间难以平衡。

在江苏省,1957年农村市场逐步开放,水产、蔬菜、鸡鸭蛋品已在全省范围内基本开放,其他土副产品及供应紧张产品仅14个县市全面开放。但是自由市场开放后,国营部门出现抬价收购。农民纷纷做生意,社员只管副业不管农业。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费用过大。<sup>31</sup>而据1962年调查,南京市投机场所主要有7处,搞投机的千余人,买卖购物票券的600人左右。<sup>32</sup>1962年11月,江苏靖江采购员杜正荣用肥皂、棉花、土布等物资与武进农民私自交易,被粮管所发现制止。由于粮食减产,后经武进有关方面同意,调换肥皂900余条,折合山芋8200斤。杜正荣等又乘机活动,收购调换山芋23500斤,小麦300余斤。其中公开调换12700斤,100斤山芋调换肥皂11条,山芋每斤0.09元。<sup>33</sup>

江浙交界吴江、嘉兴、吴兴之间的蚕茧、丝绸,不仅有个体零星的黑市贩运,还出现农业社集体销售。吴兴塘南乡将国家预购土丝1223两,销售至江苏震泽。吴江梅塘乡9人盗用乡人委、信用社主任公章,伪造私章及自产自销证,深入嘉兴抢购土绸,高价卖给上海商贩。外地公私合营企业也纷纷深入到产地向农业社以抬价、收购、预购、订购等方式抢购土绸。上海李启昌、郑隆昌等合营商号,向吴兴荃仁乡一次收购土绸1619匹。苏州正和顺合营商店不但深入农村抢购一丈纱,并向农业社预购付款,价格超过当地国家牌价20%左右。这影响了国家蚕茧、土丝采购任务的完成。<sup>34</sup>私商高价抢购,是蚕茧、土丝流入黑市的重要原因。在无锡、吴江等地区,曾发给私商自产自销证,部分农业社的负责干部也插手来搞黑市交易。<sup>35</sup>自1956年4季度到1957年3月底止,抬价抢购毛竹的浙江省内外单位共109个(其中省外100个、省内9个,大部分是国营商业、供销社、手工业社),抬价幅度一般

<sup>30</sup> 关于浙江统一收购商品市场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57-7-12,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J126-1-64。

<sup>31</sup> 江苏省供销合作社关于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情况报告,1957-1-3,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3205-长-190。

<sup>32</sup> 中共武进县委关于无锡、吴县减产地区的群众大量流入本县换取农村产品的情况报告,1962-2-23,常州市武进区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1-1-2-172。

<sup>33</sup> 武进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关于靖江县敦仪公社荷花大队以大批紧张商品非法于我县雪埭公社调换山芋的调查报告,1962-12-13,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3203-短-1885。

<sup>34</sup> 当前江、浙二省毗邻地区土丝、土绸市场管理存在的问题,1957-5-14,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3203-长-944。

<sup>35</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驻江苏省特派员办事处关于土丝市场情况的报告,1957-7-22,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3203-长-944。

比当地供销社的牌价高一倍左右,数量很大,仅扣留部分即达 1455635 支。松江城西供销社于 1957 年 2 月中旬向临安东乡朱村农业社抢购毛竹 2450 担(7350 支),每担价格 4.2 元,比当地供销社收购牌价高 2.8 倍。有的地区的手工业直接进行贩运,如临海县手工业社于 1956 年 4 季度将 30000 支毛竹卖给交通大学。<sup>36</sup>

市场上公公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的矛盾,其基本原因在于经济利益。如上海化学工业研究院来江苏武进套购木材,在汤庄乡发现江阴运来 4800 斤肥田粉,用来调换黄豆。<sup>37</sup>武进小河区进行粮食投机,包括大米黄豆元麦,常州市黑市价 18 元左右,最高 23 元。郑陆区沈法大等贩运小猪到浙江武康、武宁等地,收购大米大麦毛竹等。湖塘农民抢购蚕茧贩运上海。<sup>38</sup>魏村 2018 户 11167 人,贩卖白肉和粮食的有 460 户,占调查的六个农业社 2415 户的 19.1%,包括党员 13 个,团员 12 个,小队长、小队会计、选区代表等 30 个。<sup>39</sup>武进新闻乡吴浩金联系上海国棉一厂张永发等人,在农村大肆收购生猪和白肉。<sup>40</sup>贩运对象主要是农民、党员干部、二流子。生产集体化背景下私人收益不足,农民想办法赚钱。贩卖者利用乡土的种种便利,来和政府周旋。而基层干部的反应是不想管、不做冤家,认为贩运是农民的副业,而信用社不贷款、政府不支援,有困难不能叫农民在家等死,干部管了还是要找社里的麻烦。这些“资本主义作风”反映的不仅是公私的冲突,还有行政区划下的地区、部门和行业利益,与统一市场流通自由的矛盾,根本上来源于国家工业化、财政索取和控制物资的需求。

#### 四、计划体制下的弹性与理性

近代的工业化通过市场体系的扩大,商人的增加,城镇交易场所增多,交易规则的建立,供需关系的协调,产业布局的调整,来突破和跨越原先的行政区域,形成了一个市场试错和循序渐进的过程。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通过消费转向生产的投资拉动,形成了由农业剩余为工业化城市提供积累和降低成本的支持模式。此种模式导致了对农业劳动力和乡村资源进入城市的限制,构成城市国有经济、农村集体与个体所有制两大经济板块。行政调配强化了要素的条块分割,无法建立经济中心地和所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但日趋单一的城乡结构关系仍具有一定弹性。新时期的工业布局,也考虑到传统市场的供应关系,但是受制于行政化体系的条块分割,以及计划管理体制下的部门和地方利益。同时国家对工厂、农村地区并不能实现完全监督,应对计划之外的变化并不鲜见。城乡市场状况的千差万别与区域之间不平衡,地方行政化对市场的分割形成的市场层级的错位使得要素流动更趋复杂。国有、集体等不同产权形式下的各级企业、单位、社队和个人,都有按各自利益变通的能动性。

<sup>36</sup> 关于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以后第一、二类商品市场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57-4-27,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J126-1-64。

<sup>37</sup> 关于三季度市场管理工作总结报告,1957-10-22,常州市武进区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3-32-2-14。

<sup>38</sup> 关于当前市场投机活动情况材料,1957 年,常州市武进区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3-32-2-14。

<sup>39</sup> 关于魏村乡投机活动情况调查报告,1957.5.23,常州市武进区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3-32-2-14。

<sup>40</sup> 关于新闻乡贩白肉情况调查报告,1957-7-15,常州市武进区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3-32-2-14。

正因为不同利益主体的竞争,形成了单位和个体趋利避害的理性。例如许多工厂、企业、供销社之间的合同纠纷就是基于利益冲突,而在物资掌握上,既有地方保护和限制,又有跨区域抢购,更别说那些“投机倒把”的个人。追逐利益的理性使得第二经济可作为“缺少的市场机制的局部代用品”,它避免了指令经济的“僵硬、拖延、效率低下、失去平衡和不连贯”。<sup>41</sup>北京一位中型轻工业工厂的主管就谈到工业企业之间关系交换的重要,以及工厂和供应商、买主之间的公共关系如何通过供销机构的私人媒介来联系的。厂与厂的关系比工厂产品质量更重要,这种关系是每个厂的代表之间的个人关系,像采购员就很少更换。<sup>42</sup>

新中国建立初期城乡市场的变革对后来产权、身份、文化心理影响深远,特别是城市利用农村资源的社会成本、补偿机制和产业结构转变,因此城乡一体化并不仅仅是物质文明均等化,而更应建立在市场的自由流动和平等基础上。城乡市场的历史演进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政策的解读、变通与调适,对市场形态塑造有重要意义。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集中。人口密集的城镇和生产的地理集中,使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减少和需求扩展。生产要素可以充分地流动,但是运输商品是有成本的。<sup>43</sup>跨地域交易会带来相应成本,因此生产需要规模经济。而基层政权与产业高度融合的能动性,既为后来地方主导型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留下了政府与市场博弈的空间。

## Elasticity and Rationality: the Market Competition in Shanghai Area 1956-1962

ZHANG Yi-p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1956, the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gradually dominat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markets in Shanghai has formed a three-part pattern of state-owned commerce, cooperative commerce and private business. With the traditional distribution channels being compressed and the ol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broke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ndividuals, competition between public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of institutions have evolved into new market pattern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nd the local industry, the elasticity of factor flow and the economic rationality of interest game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departments and industries hav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market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area and the competition pattern of today's Yangtze River delta.

**Key words:** New China; Shanghai area; Market competition; Elasticity and rationality

<sup>41</sup> 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第二经济包括三种类型:1、平行经济——计划经济外的合法活动,如私人的小块农田;2、地下经济——非法活动,如偷窃国家财产、黑市买卖、贪污和贿赂;3、隐蔽经济——无法证明的活动,如家庭劳动,在亲戚、朋友和邻里之间货物和恩惠的交换以及送礼。

<sup>42</sup> 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第91页。

<sup>43</sup> 保罗·克鲁格曼著、张兆杰译:《地理和贸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V页。